

学校编号: 10384

分类号\_\_\_\_\_

学 号: 9902015

UDC \_\_\_\_\_

## 学 位 论 文

# 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

史 林 杰

指导教师: 郑剑顺 教授

申请学位级别: 硕 士

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论文提交日期: 2002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2 年 月

学位授予单位: 厦 门 大 学

学位授予日期: 2002 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 阅 人\_\_\_\_\_

2002 年 5 月

## 论文提要

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历史考察与研究,旨在对这一思潮有一宏观全面的认识与客观的评价,以期对我们当前的素质教育和整个民族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导 言:对“国民性”略作释义,对本课题研究的学术史进行回顾,并提出本文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考察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渊源。

第二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流变:以时间为序,依次考察了维新人士、立宪人士、革命人士、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人士以及守旧人士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最后,就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也作了简要评析。

第三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内涵:从进步人士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评、对理想国民的设计、以及提出国民性改造的方法与途径三个方面,对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内容进行了剖析。

第四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评价:肯定这一思潮的历史意义,并指出其理论和实践的不足与局限。

结 语:简要归纳本文要点,指出本文进一步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清末民初 国民性改造 思潮 评价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	(5)
第二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流变	(8)
第一节 维新人士的“三民”论	(9)
第二节 立宪人士的“新民说”	(10)
第三节 革命人士的陶铸国魂论	(11)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新青年”思想	(13)
第五节 守旧人士的复古国民性论	(14)
第六节 外国人看中国国民性	(16)
第七节 小结	(17)
第三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内涵	(19)
第一节 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	(19)
第二节 国民性改造：理想国民的设计	(24)
第三节 国民性改造的途径与方法	(28)
第四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评价	(30)
结语	(34)
附录：参考文献	(35)

## 导 言

### 一、国民性：难译的密码

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民性。如人们常说，骄横的日本人、直率的美国人、严谨的德国人、稳重的英国人、浪漫的法国人、保守的中国人，诸种说法虽不能包容其国民性的全貌，却也可窥一斑。但究竟什么是国民性？却是一个难以说得清、道得明的话题。因为至今尚未有一个权威而固定的概念与之相符。当然，也有不少文化精英从不同的角度给“国民性”开出了众多不同的定义：

(1) 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或民族性格，是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中的一个概念，英语中统称 National Character，是用来表示渗透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中的内在精神或心理模式，具体地表现为国民性格、国民价值规范、国民风度。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并且反复出现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众趋人格”(Model Personality)。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现象，它普遍存在于民族群体之中，成为各个民族存在和延续的内在纽带。<sup>①</sup>

(2) 国民性是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于民族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sup>②</sup>

(3) 国民性是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并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而内化为个体社会心理的伦理道德规范准则及指导这种准则的社会价值，则是国民性深层次决定因素。<sup>③</sup>

关于国民性的释义，还可举出更多，恕不一一赘举。这些解释，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依然难以凭籍精英们的智慧给国民性作出最直观的认识和理解。笔者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国民性的特征：第一，独特性，国民性的形成，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且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民所特有。第二，普遍性。国民性并不是国民个体性格的总和，而是个体性格中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对国民中的大多数成员具有普遍的制约作

① 彭明等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第253页。参见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一章。

② 温元凯、倪端：《改革与国民性改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第12页。

③ 袁洪亮：《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

用。第三，相对稳定性。国民性一旦形成，就较难更易，融入国民的性格血脉中代代相传；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亦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而逐渐改变。第四，两重性。国民性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不良国民性即劣根性或弱国民性，又含有优质基因，即优秀品质或传统美德。所以，丑陋的中国人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是并存的，不仅分别表现于不同的中国人身上，也表现于同一个人身上。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国民既是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便是国民性两重性的表现。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国民性如一个复杂、难译的密码，必须从文化、社会、人格的互动关系中才可探其源、寻其根。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竟认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工农大众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已自行消失，于是对工农大众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被束之高阁。认为需要改造的只有各种“非无产阶级”，包括新旧知识分子，这显然是片面的。谁讳言国民性改造问题，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文革”期间，中国人劣根性的大暴露、大展示表明，对国民性改造问题讳莫如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sup>①</sup>所以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长久的现代化的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制度、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近代中国在一次次救亡图存的近代化运动屡屡受挫之后，才终于意识到阻碍中国前进的障碍在于国民心理与观念的滞后和偏狭。为此，许多感时忧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探讨，对国民性改造的紧迫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就国民性改造的内容，途径和方式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构想。从19世纪末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民”思想的提出，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从辛亥时期的铸造国魂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以至孙中山的“心理建设”，都试图从国民心理、国民精神、国民性格的重塑等方面为中国救亡图强寻求一剂有效良方，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颇具声势的国民性改造思潮。

国民性改造思潮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0世纪二十年代思想界的一大思潮，伴随着时代的风雨历经百年。虽然，19世纪、20世纪已相继走完，但先哲的建言至

<sup>①</sup> 殷陆君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第3页。

今仍未完全如愿以偿。因此，回眸并梳理他们的这一思想理念，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可为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 二、学术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学者的笔触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涉及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这一研究领域，并逐渐深入拓展。至 90 年代初，因思想文化界出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热潮，学术界关于这一思潮的研究也掀起一股热浪，涌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此后便日趋平淡。

综观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有如下特点：其一，从研究对象而言，微观研究的多，宏观把握的少，研究视野偏狭。即关于这一思潮的研究，多侧重于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个案思想研究，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其中着墨最多的是梁启超，成为研究的中心对象。这种个案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从宏观上有所把握与探索，但所论多为某一社会阶层或某一政治派别的主张，而对其它阶层、派别的主张则涉及甚少或避而不谈，甚至完全否定。这就使研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客观性。难以全面、客观反映当时国民性改造思潮的面貌。其二，从研究成果的形式看，论文较多，专著缺乏。据笔者统计，从 1980 年至 2001 年，关于国民性改造问题研究的论文有近百篇，（见附录三），而关于这一思潮的专著，时至今日，尚未见到。其三，关于这一思潮研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国民性概念和历史分期等方面，而关于思潮的评价，则对其肯定、褒扬的多，而对这一思潮的局限与不足的分析，却缺乏深度与力度。所以关于这一思潮的全面研究尚须加强和深入。

实践证明，21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质就是人才和国民素质的竞争。因此，加强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对中国当前的素质教育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 三、本文的基本思路

已有的学术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参照和基础，同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现有的研究并未也不足以形成对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整体认识和全面理解。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对所掌握史料的归纳梳理，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思潮进行透视。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范围，界于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至 20 世纪二十年之间。这

一时期，中国社会动荡多变，而国民性改造思潮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波动，在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表现，有必要对其进行归纳研究。

在内容结构上，笔者拟先对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兴起的原因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其产生的深刻社会背景和复杂思想渊源。其次，将对清末民初这一时期内，不同阶段、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人士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认识一一作出归纳，以期勾勒出这一思潮的概貌。再次，拟从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评，理想国民的设计、改造的途径和方式三个方面，对国民性改造思潮作进一步具体分析。最后，通过以上的诸种分析，将对这一思潮作一评价，以期对这一思潮的历史地位、局限和不足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在结语中，归结本文要点，指出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方向。

限于笔者才疏学浅，学力不济，本文必有诸多不足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 第一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

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复杂的社会条件，又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闭关锁国的生存状态被打破，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军事侵略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次次战争的失败与割地赔款，把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民族危机空前严峻，救亡图存成为国人面临的最主要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面对山河碎、金瓯缺的危局，国人从未放弃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努力与探索，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便是中国蹒跚走向近代化努力的见证。所以，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国遭侵略、受压迫的苦难史、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探索史、奋斗史。遗憾的是，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梦灭金陵；洋务运动则随着北洋海军的檣倾楫摧而折戟沉沙；维新运动则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而握旗息鼓。屡次探索的受挫，使一部份国人开始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不再从器物、制度方面寻求失败的原因，而是从国人本身的弱点来反思失利的根源，从而对中国国民性产生了质疑。中国数十年探求新法以图富强而不果，其原因就在于对“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sup>①</sup>维新运动虽新其政，但不新其民；新其法而未新其学，所以难以成功。几十年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实践证明，要真正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就必须有一个具备近代文明素质的国民群体。这种时代性的认识，激发了国人对国民性改造的思考。从严复“三民”思想开始，到20世纪初梁启超“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这一全新命题的提出，当时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围绕着国民性，国民素质，以及国民与革命，国民与救亡的关系问题纷纷呈言，形成了一股国民性改造思潮。其中严复、梁启超、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革命先驱与思想大家更是这一思潮中的突出代表。所以，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既是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化实践的必然总结。

从思想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既有西方传入的丰富的近代理念，又有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因素。

<sup>①</sup> 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第48页。

近代闭关锁国状态的打破，为国人提供了探视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也为国外近代先进思想的涌入提供了通道。近代资本主义的民权、民族、国家、自由平等进步思想观念的传入，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国人的觉醒。无疑为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在古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往往把“国”与“君”联系在一起，“朕即国家”，忠君即爱国。晚清时期由于新思想的涌入与影响，国人更新了国家观念，国与君开始分离，而国与民开始相联。国家不再是君主私有，而为全体国民所共属，忠君不等于爱国，忠于民族、人民才是爱国。对此，维新派健将谭嗣同对此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认为忠君是助暴虐民的“愚忠”，而人民是国家之本，报国必须为民，离民而谈忠君，那是本末倒置。忠臣为君“掎克聚敛，竭泽而渔，自命为理财，为报国，如今之言节流者，至分为国为民为二事乎？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忧？何也？与我无与也”。<sup>①</sup>在此，谭提出近代与古代爱国观念的区别在于：分国与君为二事，视国与民为一体。爱国、报国体现为“为民”“爱民”，这无疑是对传统爱国观念的一种理性升华。但影响最直接的，还是欧洲、日本的国民性改造思想。19世纪后期，国民性问题曾是各国议论的焦点。英国作家塞缪·斯迈尔所著的《自助论》、《性格论》、《节俭论》、《责任论》，在当时广为流传，进而影响到东方的中国。而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有关国民性的理论更是为中国国民性改造提供了重要借鉴。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探索。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启蒙思想家认真探究了国家兴亡与国民素质之间的关系，认为国民的德智是促进国家强盛与进步的基础。受此思潮影响，20世纪初，在国人创办的进步杂志上，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丰永吉的《文明史》，福本诚的《当代欧洲》等书陆续翻译发表，为中国人研究西方文化及进行国民性研究提供了借鉴。如福泽谕吉把文明的发展进程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阶段，并认为中国处在“半开化”阶段。他在描述这个阶段的特点时其实已触及到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说，中国“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但察其内部则缺欠太多，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少；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猜疑嫉妒之心甚深；但在讨论事物的道理上，却没有质疑问难的勇气；模仿性工艺虽巧，但缺乏革新创造之精神；只知墨守陈规不知改进；人与人相处虽有一定规矩，但由于习惯的力量特大还不成体统。”<sup>②</sup>

①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341页。

②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1982，第9—10页。

此外，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入对国民性改造思潮也影响颇巨。19世纪末，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及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引入中国。使国人知晓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生物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争亦是如此。若中国再不思图强，亡国灭种将不可避免。要实现民族振兴的梦想，只有提高国民的竞争能力，即提高国民的自身素质，方可使中华民族在日趋激烈的民族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sup>①</sup>因此，许多有识之士把思考的视角不约而同转向国民性的改造。

从思想的历史传承而言，在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至尊的文化观念中，关于人的自身价值和自我修养问题，集中表现为一种“道德人本主义”。在儒家的人学思想中，无论是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教，还是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理念，不论是程朱的天理人欲之变，还是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都渗透了“吾日三省吾身”，革除人欲，恢复天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导向。其实质就是把人的自我完善基础沉落于自我道德的完善上，这构成了封建伦理精神的核心。到了近代，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时，进步人士对西方近代思想加以生吞活剥，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对封建伦理精神的核心——三纲五常，展开了猛烈批判，但是他们仍然继承了中国古代人学的特点——以伦理为本位，即以道德革新来理解和阐释西方近代思想。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道德革命”，陈独秀伦理的觉醒等主张，同中国古代哲学的“道德人本主义”一样，以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来塑造国民的精神面貌是他们对近代国民理想人格设计的共同模式。当然二者“道德”的具体内涵是根本不同的，但在原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在思想渊源上，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有两个源头，表现上，它直接受惠于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的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却与籍道德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sup>②</sup>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第18页。

② 袁洪亮、郭汉民：《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简论》，《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

## 第二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流变

中国近代抵抗外敌入侵战争的一次次失败，民族危机的一步步加深，自强改革的屡屡受挫，刺激和促进了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但是这种对“民”渴望有新的形象的认识，早在思潮兴起之前，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对此问题已有了零星、朦胧的思索。19世纪中叶，晚清王朝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sup>①</sup>龚自珍认为这是人心风俗破坏所致：“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若这种不祥之气长久郁于天地之间，“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sup>②</sup>谁能挽回社会上这种衰颓之势呢？龚自珍把希望寄予了“山中之民”，若“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则“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sup>③</sup>在他的潜意识中，中国正在孕育一种具有新气质的民来拯救这末世危机。

鸦片战争之后，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使开明之士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他们主张以改变人心与开发人才来应变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认为，只要中国人向外国学习新知，那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从此，“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sup>④</sup>具有长技的西海之民便是魏源选择的仿效模式。然而个别开明之士的呐喊，并未给正在沉睡的国度以强烈震撼，中国又在无知与自大中蹉跎了2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终于使清廷产生了自强的渴望。洋务运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倡导下，同时也在守旧人士的反对声中艰难起步。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移植西方先进的科学与军事技术，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是具有近代文化素质的人才极度匮乏。传统的教育体制只能培养出熟读四书五经，梦想升官发财，忠心效忠皇上的奴才，因此冯桂芬大胆揭露：科举制“意在败坏天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人才”。<sup>⑤</sup>所以，改革教育，实现传统人才向近代人才的转变势在必行。于是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新式学堂的建立、留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近代化的先驱，推进了近代化的进程，也促进了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的转变。正是这批具有近代知识思想的人才，在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难深重之时，才真正揭开了国民性改造的序幕。

①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87页。

② 龚自珍：《平均篇》，《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6，第11页。

③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88页。

④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第31页。

⑤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77页。

## 第一节 维新人士的“三民”论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洋务思想家们虽然批评科举制，改革教育制度，但他们所关注的是受正规近代教育为办洋务所需要的人才，而非广大民众。1894年，中国出乎意料地败于东洋小国日本，全社会舆论哗然，真正促进了国人的猛醒。“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至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sup>①</sup>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总结数十年近代化失败的教训，开始把关注的视点从数量有限的人才的培养转到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sup>②</sup>中国之所以落后就在于“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sup>③</sup>梁启超则指出，中国若无新民，“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sup>④</sup>在众多的新民主张中，严复的“三民”思想是戊戌时期最引人关注的新民思想。

严复曾毕业于洋务人士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77年至1879年留学英国，使他有 机会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造诣颇深，连维新泰斗康有为也称其为“中国西学第一者”。留英期间，严复广泛涉猎了亚当·斯密、达尔文、赫胥黎、约翰·弥尔等科学家、思想家的著作，颇得其中精髓。斯宾塞的《教育：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中的教育“三育”思想成为严复“三民”思想的主要来源。斯宾塞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他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用进废退”原理来解释社会进化与德智体的发展。“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防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后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备”。<sup>⑤</sup>意思是说只有生存竞争才可促进德智力的进化。严复十分推崇斯宾塞的观点，并进而发展了其理论。严复认为一国之强弱、贫富、治乱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sup>⑥</sup>所以，民力、民智、民德是国家自强的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示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书店）出版社，2000.6，第249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第131页。

③ 《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935页。

④ 《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第21页。

⑤ 严复译：《天演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第37页。

⑥ 《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第25页。

隳废”。<sup>①</sup>中国之所以在对日战争中失败，就是因为中国民力已困，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所以，严复于1895年明确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从社会政治学到文化心理学的转换中，率先提出社会环境的深层土壤改良问题，即国民性改造问题，从而把中国文化主体心理结构的近代化，即人的近代化提上了历史日程。

严复的“三民”思想，主要是通过中西对比的方式，提出一个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初步方案。鼓民力，用强健的体魄与冒险精神来改造国人从体质到精神的“病夫”形象，开民智即用近代资本主义的新理论新知识开启民智，使全体国民的思维方式和智识程度适应近代要求。新民德则指用西方近代自由平等的民权观和伦理观来作为国人的行为准则。由此可见，严复的“三民”理论已远超出斯宾塞的教育思想范围，且有典型的文化重建的意义。“具体地说，其意义就在于开始了近代伦理精神，感性生命与理性精神的三大重建”。<sup>②</sup>

### 第二节 立宪人士的“新民说”

维新变法之前，严复有关“三民”思想的文章，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激荡和共鸣。政变后，取代严复而为国民性改造竭力呐喊的梁启超，则把国民性改造思潮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独居异乡，他深刻反省变法失败的原因。在此期间，他广泛涉猎西学，使他发现一个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崭新世界。比较之下，传统文化的诸多弱点，以及其对民族性格形成的负面影响，让他痛感“开民智、振民气、新民德”之重要，“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sup>③</sup>维新运动的失败正好证明了这一认识，光绪帝虽有变法的万丈雄心，维新志士亦不乏精进勇猛的精神，但绝大多数国民却缺乏变革的要求和主动性，光靠光绪帝的“一切独断，裁自圣心”，是万万不能担负起变革中国的历史重任的。“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矣。……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sup>④</sup>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英国

① 《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第514页。

② 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第80页。

③ 《过渡之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7页。

④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2卷。

社会学家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新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型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作为中国变法运动的参与者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睹者，梁启超对上述原则有更深切的体认。因此，梁启超终于明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长期致力于变法图强的事业，而又始终未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新民之道未被重视。所以，1898年12月，梁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开始“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sup>②</sup>1902—1904年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不但发表了《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论述国民性的文章，而且连续刊载了《新民说》一文，后来汇集成单行本，共20节11万余言，详细论述了新民的涵义、方法、内容，使近代的新民理论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如果说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大国民性改造命题的话，那么，梁启超则完成了“三民”理论的思想体系和逻辑结构的建造。《新民说》一出版，便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一时之间，《新民说》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影响颇大。不仅影响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并且对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后来的进步思想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 第三节 革命人士的陶铸国魂论

1898年维新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和平改革道路在中国失败，但这并非意味着改革浪潮在中国的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虽然受挫，但由此而引发的革命图强的新思想新观念，却如涛涛江水汹涌奔腾，成为呼啸新时代到来的思想主流。屠杀和压制永远关闭不住思想解放的闸门，也永远阻挡不住先驱们寻求救国途径的探索。1900年，有三种不同的力量挟着武器次第发难于中国南北。5月，以黄河流域下层民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声势浩大，轰轰烈烈，但最终被清廷利用并出卖；7、8月间，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动会党发动自立军勤王起义，他是维新中的激进者，虽以武装斗争的面貌出现，但依然没有冲出保皇维新的堡垒；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珠江流域发动惠州起义，虽然只是一隅闪电，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却代表了当时中国最进步的力量。伴随世纪初多变的政治风雨的历练，它

① 殷陆君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4页。

② 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册，光绪24年11月11日。

的色泽日益鲜明与亮丽。

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形式出现的。所以,20世纪初,正当梁启超的《新民说》在思想界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革命派也异军突起,以革命的方式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革命派从义和团那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无畏精神,看到了“民”的作用。陈天华认为“民心所归,大事可成;民心所离,立见灭亡”。<sup>①</sup>但是,“夫外人之敢于割我土地,剥削我膏腴,监督我政权,刍狗我士庶者,以我无国民故也。故无不悲中国之亡,而悲中国无国民”。<sup>②</sup>所以革命派认为,改造和消弭国民劣根性,重铸国魂民魂是时务之急。一时之间,《民报》、《江苏》、《开智录》、《浙江潮》等革命刊物纷纷刊载倡言改造国民性的文章,热潮迭起。“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气不生,国将焉存?”<sup>③</sup>《浙江潮》自1903年创刊便连载《国魂篇》。作者主张以祖国主义为中国魂来激发国民保国、爱国、救国的热情,进而使全民族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因此,陶铸国魂的本质就是实现民族精神的重铸。

作为革命派中坚的留日学子们,更是急不可待,操起手中如椽之笔,纷言国民性,各抒己见。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太炎的《菌说》、《馗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均在当时引起深刻反响。陈独秀在其所办的《安徽白话报》上指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sup>④</sup>他认为这不好的性质主要有两桩:一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二是只知天命,不知尽人力。而这一时期的鲁迅,也撰文为改造国民性摇旗呐喊。在他早期的《摩罗诗力说》(1908)、《文化偏至论》(1908)等文章中提出,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根本在于启蒙,在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改造,充分显示出“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魅力。

这一时期的革命人士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继承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而又使之与革命手段和共和方案结合起来,这就使他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然而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于理论和政治的需要,革命人士约于1905年后一反过去对国民劣根性的痛斥,转而赞美国民性的优良。陈天华认为,中国人“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质”,国民义务感和勇武精神不亚于甚至优于其它国家。<sup>⑤</sup>孙中山也认为“我们

①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111页。

②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之责任》,《湖北学生界》1903年3期。

③ 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1907年1期。

④ 《亡国篇》,《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81页。

⑤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03—210页。

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sup>①</sup>早就“禀有民权之性质”，“自由之性质”和自治的传统。<sup>②</sup>因此，他认为中国国民已具备共和国民资格，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完全可行。而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认为“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共和国民之资格”。<sup>③</sup>因为“我国民自治力之甚弱，而非可徒以政府压制为解，……使今日政府幡改焉，颁宪法、行民政，举立法、行政、司法诸大权，而一旦还诸我国民，我国民遂能受之而运用自如耶？”<sup>④</sup>针对立宪人士的责难，革命人士指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sup>⑤</sup>这就是1905—1907年间，革命人士和立宪人士因政治分野而在国民程度问题上的论战。结果是革命人士在论战中取得绝对优势，逼得立宪人士草草收场。此后，革命思潮占据思想界之主流直至辛亥革命爆发。

###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新青年”思想

历史的实践证明，优良的国民性能把一个民族推向历史的前台，反之又可将一个民族拖进历史的深渊。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岂不说明了这一规律。1911年，武昌起义，清廷覆亡，共和肇肇，曾激起人们中兴国家的无限希望。但是随着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共和，这一被认为是政治之极致的政体名存实亡，又让人们在无限痛苦中去反省。杨昌济认为政治不良，少数执政者固然有罪，但多数国民“独无罪乎？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国民自身国家之本体也，本体一坏，尚欲何说”。<sup>⑥</sup>所以鲁迅断言：“改革社会，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全旧，全不行的”。<sup>⑦</sup>陈独秀指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之改善”。<sup>⑧</sup>所以国民性的改造又一次成为人们所普遍关心的共同课题。

如果在20世纪初的第一个10年，梁启超是言论界的骄子的话，那么当历史的车轮驶及第二个10年，伴随着《新青年》这轮无比壮丽之精神旭日的升起，陈独秀

①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第280页。

② 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第235—236页。

③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9期。

④ 梁启超：《敬告我国民》，《新民丛报》，第25期。

⑤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76—178页。

⑥ 《国民》1卷1号，1919年1月1日。

⑦ 鲁迅：《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26页。

⑧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207页。

则成为一颗新的“思想界的明星”。<sup>①</sup>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于是中西文化之争，新学旧学之争，激荡于时人的心胸，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正是时人深入批判传统文化必然要提示的重大社会课题，无论是康有为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的《大中华》，还是陈独秀的《新青年》北大学子的《国民》，新旧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及其刊物，都在评说国民性。所以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新旧文化斗争的又一焦点，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的重要表征。

1917年，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把《新青年》迁往北大，北大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顾孟余、钱玄同、章士钊、杨昌济等一时之名彦齐聚北大，他们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大旗，倡言民主与科学，对中西文化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比较，力图构建一种新文化，以新文化、新道德来重塑国民的精神风貌。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新青年必须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sup>②</sup>在此期间，鲁迅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1919）、《药》（1919）、《阿Q正传》（1921）等一系列立意于国民性问题的小说，对国民的愚昧、麻木不仁刻画的淋漓尽致。《狂人日记》从思想文化的高度透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质地，提出启蒙的必然要求。《药》则形象地说明了民主革命过程中不良国民素质的可怕与启蒙的艰难。面对革命者的鲜血，民众没有一丝同情却尽是非议与责难。对此，鲁迅只能感叹：“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衷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sup>③</sup>

### 第五节 守旧人士的复古国民性论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教育宗旨之下，北大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阵营。一是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新派；一是以辜鸿铭、刘师培为首的保守主义旧派。新旧两派分别以《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为阵营相互交战，相互对垒。正值新派以批判的目光审视中国国民性，着力于针砭国民的劣根性时，辜鸿铭却以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和西方通的身份，向西方人大力介绍吾国吾民，以让西方人准确地理解中国，认识中国。

① 毛泽东：《湘江评论》，1919年创刊号。

② 《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3—9页。

③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第80页。

严格来讲，在近代“中学西渐”史上，有三个中国人的著作前后相继在西方真正畅销过，他们是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早在19世纪80—90年代，陈季同的法文版《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已在欧美引起深刻反响。在20世纪头20年，辜的作品却走红西方，可以这样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20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sup>①</sup>而20世纪30—50年代，林语堂的著作也畅销一时，他们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面对欧洲读者，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对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应邀在欧洲发表演说，题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此演说后来在北京刊行，影响颇大。辜认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就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应补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灵敏。<sup>②</sup>这四大特征，西方各主要民族往往有此无彼，如美国人博大而不深沉，英国人深沉而不灵敏，不能象中国人一样一应俱全。此外在辜氏眼中，国人还具有温良、顺从、和平的美德，并以此为自豪，相反，西方人性格中则充满粗暴、无礼和兽性十足的因素，这将致西方文明走向毁灭。因此要拯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就必须采纳中国的“良民”宗教，采纳中国的儒家文化。正如林语堂所评说的那样，辜发表《中国人的精神》，目的是为了“替中国人争面子出出气”。<sup>③</sup>于是，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中国事物加以呵护，乃至为纳妾、缠足辩护，居然认为西太后是中国文明所培育的女性之最高典范。辜氏的爱国赤诚诚然可嘉，但所抱的却是一种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不健全的文化心态。鲁迅所批判的“爱国的自大”，指的就是这种爱国者。然而，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一露峥嵘，光有古老民族的自负是远远不够的。

此时在北大之外，社会上还涌起一股反对国民性改造，主张恢复固有国民性的逆流，以康梁等人为代表。作为孔教派首领的康有为认为，辛亥之后，民德之所以衰落，是因为革命诬蔑抛弃孔教的原故，所以必须恢复尊孔读经，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国之国性。辛亥前曾为改造国民性大力鼓而呼的梁启超，此时虽不支持成立孔教，但他的认识却与康有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只有孔子的教人立身处世之道有裨益于今日的国民，这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之“生理与其心理，则常有所同然

① 《中国人的精神》前言，海南出版社（海口）1996.7，第12页。

② 《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第5—6页。

③ 林语堂：《辜鸿铭》，《人世间》，1934，12期。

者存”，孔子在这方面的学说，具有“措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价值，国民都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就能培养英国人那样的理想人格（Gentleman）。他还指出这是和今日的个人主义教育相符合，进而培养具有国家主义观念国民的必要途径。<sup>①</sup>这种尊崇传统，否认国民性现实改造的主张是一种历史的复古倒退。

诚然，中国传统国民性中也有传统美德存在，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有传统美德这些优质基因的存在，而忽视传统国民劣根性的存在与危害。世界已走向近代，而中国依旧在中世纪徘徊，正是这些劣根性的存在，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严重阻碍。中国要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就必须对国民性进行一次近代改造。所以，无论是辜鸿铭，还是康梁，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都对固有国民性加以美化，用孔子教义来教化国民，反对国民性改造，这是一种不现实的保守落后主张，是不可取的。

## 第六节 外国人看中国国民性

在近代中国，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国人抱着救亡图存的目的，对国民性倾注了极切的关注。但与此同时，国门的打开，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一些外国的传教士、商人、政客等所谓外国观察家或者说“中国通”们，也抱着不同的目的涌入了中国。通过多年的接触与了解，对中国文化、中国民众有了相当的认识，于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主观感受，记录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一些看法。这样的著作主要有：

[美]	明恩溥	《中国人的性格》	1890
		《中国人的气质》	1894
		《中国人的乡村生活》	1899
[美]	何天爵	《真正的中国佬》	1895
[英]	阿绮波德·立德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1901
[英]	麦高温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1909
[美]	E.A 罗斯	《变化中的中国人》	1911
[英]	麦华佗	《在远东中国的外国人》	
[英]	杨笃信	《中国五十年史》	
[英]	莫理循	《中国风情》	
[英]	艾约瑟	《中国的宗教》	
		《中国人的宗教条件》	

① 《大中华》第1卷第2期，1915年2月。参见《梁漱溟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235—242页。

在以上这些著作中，作者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述视野开阔，范围广泛，但观点杂乱而零散。而仔细梳理也可看出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看法的脉络。一方面，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诸如崇德尚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乐观豁达，坚强忍耐等进行了赞美与肯定。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人虚荣、保守、散慢等劣根性也进行了剖析。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对中国人总体评价基调是不高的。如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如此描述中国人的特性：没有准确的概念，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天性，理智混乱，轻视外国，因循守旧，没有同情心，相互怀疑，没有诚实等，洋洋洒洒罗列了26条罪状。勤劳、节俭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成为其讥笑的题材。甚至胡说：“中国妇女在临死之前，要自己走到坟地，以节省别人抬尸体的力气。”<sup>①</sup>书的最后指出“中国文化是自私的，需要美国的发财文化，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需要美国的商品和现代科学。”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永久地完全地满足这种需要。”<sup>②</sup>这就是说，中国只有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生存的希望，其传教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显露无遗。

从文化的角度考虑，研究国民性首先必须对铸造这种国民性格的文化有深切的感受与深入的研究，外国人在体认中国国民性时虽然避免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使这种体认由于文化背景的惨淡而流于肤浅，因此，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解读往往只停留于表面的叙述而缺乏深层的剖析。加之他们抱有各色的政治或经济目的，使他们的叙述往往也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 第七节 小结

以上我们分六节对清末民初的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流变进行了梳理与剖析，不难发现，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与近代的政治变革是交替演化层层推进的。思潮的勃兴为政治变革的发动起了启蒙作用，而政治变革却使国民性改造思潮一步步推向深入。戊戌维新时期，维新人士所寻找的富国强兵之道，就是在实行君主立宪的同时，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新民。于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应时而生，并在士绅阶层引起深刻反响。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却证实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戊戌后到辛亥前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趋向不同，资产阶级阵营分化为保皇立

① 转引自：《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第36页。

②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360页。

宪派与反清革命派，思想界也出现了立宪思想与革命思想交织的局面，所以关于国民性的改造也出现了两种相异的方案。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立宪派，继承严复的“三民”主张，首先打起新民的大旗。他们强调宣传教育，通过思想启蒙的途径来改造国民性，即思想启蒙——国民性改造——优良政治出现这样的方案。而异军突起的革命派，在立宪人士新民思想的影响下，也认识到了国民性改造的必要。但在改造方法上革命派却另辟蹊径，力求通过革命来涤荡尽所有的国民劣根性，从而把自由民主的理念植入民心，实现国民的近代转换。其改造的方案为革命——优良政治——国民性改造。其实，两派在国民性是否改造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分歧的关键主要在于如何处理国民性改造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关于此问题，后文将进一步论述）而辛亥到“五四”期间，中国思想界关于国民性是否改造问题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陈独秀、鲁迅为首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人士，从中西文化的对比入手，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主张以民主和科学武装国民。而以康梁等为首的守旧人士，则根本否定国民性改造的必要。认为中国传统国民性完美无缺，只要恢复固有国民性，就可实现“新”国民。这两种方案的对立，其实质则反映了新文化与旧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关于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因其立场与视角的迥异，难以与以上五种思想流派同日而语，故另立一节加以表述。综观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流变，试作下表表示：

时间阶段	派别	代表主张（作品）
戊戌时期	维新人士	“三民”论
戊戌到辛亥	立宪人士	“新民说”
	革命人士	陶铸国魂论
辛亥到“五四”	新文化运动人士	“新青年”论
	守旧人士	复古国民性论
	外国人	《中国人的特性》

## 第三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内涵

国民性改造思潮有哪些具体内容？提出哪些具体主张？前章已有所涉及，本章再作进一步的系统归纳和阐述。

### 第一节 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

国民性为什么要改造？因进步人士觉悟到旧国民性的劣质，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旧国民性的劣根性在哪里？进步人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揭露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 一、愚昧无知、麻木冷酷的精神状态

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日益加剧，而中国大多数国民却像一个无脑筋的动物，只知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根本不知有事，无所谓办与不办；也不知有国，管他亡与不亡，与我何干？面对这些被无知麻木的精神病态所笼罩的民众，梁启超指出：“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sup>①</sup>或许梁氏的语言过于危言耸听，但一个国家建立在这样的民众之上，国将何以兴？

#### 二、虚荣自欺、自我安慰的行事方式

虚荣，用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爱面子，这是一个令外国人费解的话题。他们认为，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是一个格式的问题。”并指出中国人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真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sup>②</sup>所以，不敢正视现实的中国人只能“用欺和瞒，造出奇迹的逃路来，而自己为正路。在这条路上，就证明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坠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sup>③</sup>鸦片战争之后，不平等条约的连续签订，割地赔款不断，清廷依然感觉尚好，仍自诩“天朝上国”。真可谓“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sup>④</sup>外国侵略者正是明晓中国人这一特征，才明予我以

① 《呵旁观者文》，《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29页。

②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第16页。

③ 鲁迅：《论睁了眼睛看》，《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40页。

④ 鲁迅：《论睁了眼睛看》，《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38页。

虚名，而阴则谋取实利。德国人占胶州，约书上则念念不忘写上“大清国皇帝为确定中德友谊”一类冠冕堂皇之言，而清廷听之顺耳，受之顺心。统治阶级这种自欺的精神胜利法，深深腐蚀着人民群众特别是下层阿Q式的落后民众，他们随时随地都受到他人的压迫、侮辱，但又随时随地可反败为胜，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这种把失败当胜利，把耻辱作光荣的病态心理，正是进步人士所极力针砭的欺和瞒的国民劣根性。

#### 三、乐于旁观的看客心理

梁启超认为：“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sup>①</sup>因此他以淋漓之墨，将旁观者群分为浑沌派、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六大派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指出旁观者是最大的放弃责任者，所以，看客心理是一种卑劣低下的心理品质。早年赴日学医的鲁迅，也正是因为不能忍受看客的嘴脸，才改变了他人生的选择。一次在仙台医专所放映的幻灯片中，“我竟然在画片上忽然会见到我久违的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那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盛举的人们。”这样的经历使鲁迅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sup>②</sup>于是鲁迅毅然弃医从文，成为一位针砭时弊的国手，以自己的笔来唤醒民众。他在《药》、《明天》、《孔乙己》等小说中对旁观者隔岸观火的冷漠无情作了痛彻的否定。他认为那些“拿‘残酷’作娱乐，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做安慰”的暴君的臣民比暴君更暴。<sup>③</sup>

#### 四、奴性十足的性格

所谓奴隶性，是指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民众安分、柔顺、听命、卑怯的服从性格和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意识。对于这种畸形的人格，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用最严厉的言论对其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奴隶云者，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

① 《呵旁观者文》，《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28页。

②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6—417页。

③ 《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66页。

待命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得主人一盼，博主人一笑，则如获异宝，如膺九锡、如登天堂，豁然夸耀侪辈以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僵，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大耻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怡然安为本分。”<sup>①</sup>

“奴隶者，其喜惧颠倒悉听于他人之憎爱，闻有挫我折我者则色然而忧，闻有庇我养我者则欣然而喜。故君相而能庇我养我也，则奴颜婢膝唯唯听命，牛之马之不以为苦，盗之贼之不以为辱，苟能遂其高车驷马锦衣美食之心，则甘为一姓之家奴而不辞。”<sup>②</sup>

“我国民夙钟依赖之恶性，以土地为一家之私产，以人民为一家之私奴，以政治特权为仅少人士之专有物，而于监督政权之事，则曰非吾侪小人之所能及焉。饮食男女之外无思想，自私自利之外无责任，纳租税、供鞭撻之外无事业，惟知服从专制主权，则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天宪，荣辱之惟彼，生杀之惟彼，曾未尝建一言，参一政，以增和平之幸福焉，则如在网之鱼，在笼之兽，一任主人之左右之、支配之，而无丝毫自主之能力。”<sup>③</sup>

以上三则材料对奴隶性的特征和表现揭示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奴隶性，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因此有人哀叹：“悲夫！黄帝神农之子孙，皆肃静之奴隶也。”<sup>④</sup>“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sup>⑤</sup>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sup>⑥</sup>他所塑造的许多艺术典型更是反映这一劣根性的鲜活例证。

#### 五、思维方式的偏颇

千百年来，国人形成了重整体、重人伦、重直觉、重经验的思维特性。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只求笼统，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只关心与其人生密切相关的学问。并且喜欢盲目的求同、尊古、崇圣，而不去主动地怀疑、求异、创新。对此，严复

- ① 《中国积弱之源于风俗者》，《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第23—24页。
- ② 《说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74页。
- ③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3月。
- ④ 《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482页。
-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第358页。
- ⑥ 《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12页。

即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sup>①</sup>“中国之智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人教育子弟事事必求古训，而西洋“教其弟子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sup>②</sup>由于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国人难以孕育出近代科学技术，因为近代科技更注重分析性思维，逻辑性思维，理论性思维。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深刻指出，“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中国传统之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完整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 16、17 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重大缺陷。”<sup>③</sup>

#### 六、体质之孱弱

“东亚病夫”之称，对国人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有识之士皆为之愤愤不平，但也不能不承认。由于长期以来，国人以读书穷理、跻身仕林为荣，以当兵习武为耻，轻视体育锻炼，加之吸食鸦片与缠足等恶习，使国人体质虚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学生只知死读书，而不知体育锻炼，结果是“翩翩少年，弱不禁风，名曰少年，弱于少女。”<sup>④</sup>于是陈独秀慨叹：“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要，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sup>⑤</sup>

以上种种揭露和批判，可谓切中时弊入木三分。而进步人士在揭露和批判的同时，也在苦苦寻找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

什么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根源？首先，进步人士把目光投向了封建专制制度。“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因此梁启超指出：“天下坏伦常，毁天性、灭人道、破秩序之毒物，未有甚于专制政体焉者。”<sup>⑥</sup>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统

①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第1页。

②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第29页。

③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第208页。

④ 《论尚武》，《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第191页。

⑤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20页。

⑥ 《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232—238页。

治而推行的“愚民、柔民、涣民”政策，是其“驯民、餽民、役民、监民”的最终目的。所以梁启超言辞激烈地说：“使我数千年历史以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sup>①</sup>由于长期处于君主专制之下，所以中国“蚩蚩之民，无权无势，既畏惧王法之森严，又忧惕强权之暴厉。于是乎不得不孺然驯伏，禁舌无身。虽以艰勤辛苦所经营之自家财产，亦任其吞蚀而不敢少动；虽以天赋本能之权利自由，神圣尊严之人格性命，亦一任其剥夺，一任其辱蔑而不敢反抗”。<sup>②</sup>鲁迅亦尖锐指责，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总根子在皇帝为维护万世子孙的统治地位而提倡的安份守己的愚民政治，所以愚民的出现是历代统治者的“治绩”。<sup>③</sup>

其次，进步人士注目于封建伦理纲常和封建教育的长期熏陶。封建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封建伦理纲常。而历代统治者为了让子民安于现状，对其大肆宣扬，使之成为束缚民众的枷锁，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长期这样便造就了国人缺乏活力的被动性格，“仁之实为事亲。义之实为从兄。胥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身，乐以和民气。胥此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sup>④</sup>因此，革命人士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专制之国莫不以虚伪为元气，而我支那者尤专制中之专制者也。故保赤牧民以为仁，束缚驰骤以为礼，予知天纵以为圣，顺民奴隶以为忠，割股理儿以为孝，焚身殉葬以为节，日日言五帝三王而淫虐愈甚，日日言治国平天下而糜烂愈甚。”<sup>⑤</sup>严复认为，传统的教育内容与考试方式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起了强化作用。中国士人之所以苦读四书五经，最终目的是入朝为官，正所谓“不为功名不读书。”这样就强化了受教育者的顺民性格。“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sup>⑥</sup>

再次，部分进步人士还从地理环境、家庭制度方面对国民劣根性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严复认为，中国“徒以神州奥壤，地处温带上映，民生其中，不俟冒险探新，而生计已足，此所以历代君民皆舍海而注意于陆。自弃大利，民智亦因以自封，遂

① 《拟讨专制政体檄》，《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380页。

②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586页。

③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63—100页。

④ 《广解老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429页。

⑤ 《广解老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430页。

⑥ 《箴奴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702页。

致积重以百年来之世面。”<sup>①</sup>优越的自然条件给人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之需，但同时也促成了人们思维的封闭性。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落后加深了中国人的保守性，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一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之概，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至于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sup>②</sup>近代中国人以这种夜郎自大的心态揣度已经发展了的西方世界，就不能不表现出盲目保守与极度排外性。而革命人士则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中国二千年来，家庭制度太发达，“故使民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sup>③</sup>这就使我国民只知有家族观念而无国家思想，难以顺应近代潮流的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是在中外国民性的比较中，尤其是在褒西贬中的比较中进行的。这种比较大多缺乏科学根据与严密论证，所以其批判带有感情用事或愤世嫉俗的缺陷，咒骂多于理性的辨析。然而这种揭露和批判并不是为了厚古薄今，也并非崇洋媚外，而是进步人士面对山河破碎，民魂衰颓的现实，愤怒谴责黑暗专制制度对国民人格的践踏和扭曲，以此来惊醒沉梦未醒之“支那人”，迎头奋进，跟上世界近代化发展的潮流。因此，这些无情的批判和解剖，无损于民族的尊严，反而可促使人猛醒。正如马克思所言：“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sup>④</sup>

## 第二节 国民性改造：理想国民的设计

面对中国国民性不容乐观的客观现实，进步人士以敏感的心灵咀嚼民族深处的创伤苦楚之后，以淋漓的笔墨对国民劣根性一一进行了批判与曝光。批判是一种扬弃，一种转换传统的必要步骤，只有如此，才可能疏通通向近代化的河床。因此，进步人士在揭露和批评之后，提出国民性改造的主张，为未来的理想国民做出了设计。

什么样的国民才是理想的国民呢？当时，进步人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述。邹容认为“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

① 《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第257页。

② 《论进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35—236页。

③ 《家族革命说》，《江苏》第7期，1904年1月。

④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页。

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sup>①</sup>并指出，真正的国民应具备如下四种精神：“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sup>②</sup>1903年《江苏》杂志上的《国民新灵魂》一文作者认为，新国民应具备五大灵魂：山海魂（冒险探险精神），军人魂（铁血主义，尚武精神），游侠魂（拔剑而起，屠腹而谢天下的勇士风度），社会魂（平等博爱思想），魔鬼魂（暗杀、侦探等精神）。<sup>③</sup>梁启超从理论的高度系统而细致地阐述了国民应具备的品格和性质。其中包括公德、国家思想、冒险进取精神、自由观念、平等思想、自治力、进取心、合群意识、坚强的毅力、尚武的精神、强悍的民气等。综观进步人士的设想，归结到一点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民为参照，塑造一个真正具有近代意识与特征的新国民形象。考察他们的思想脉络，主要可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

#### 一、国民之资格——理想国民之必备条件

近代意义国家观念的出现，使传统国人视国为天下的观念成为历史发展的桎梏。中国人要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就必须实现传统臣民向近代国民的转变。“国民者，一国之主人翁也”。<sup>④</sup>而我民族缺点之所在，不在于无爱乡思想，而在于无爱国思想；不在于无民族资格，而在于无国民之格。因此有识之士，告诫国人，要想成为真正的国民，就必须树立明确的国家观念，让“我即国，国即我”之理念深植于脑，铭刻于心。若中国人人都有国民之资格，“则20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躡足而待也。”<sup>⑤</sup>

#### 二、自由与平等——理想国民之人格特征

从某种意义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对人摧残压抑的历史。民众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只有被统治阶级“鞭之撻之，敲之削之，戮之辱之”的份儿，因此奴性十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sup>⑥</sup>放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第357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第352页。

③ 《国民新灵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三联书店，1978，第573—576页。

④ 《思想一勺》，《湖北学生界》，1903年5期。

⑤ 《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10日。

⑥ 《致康有为书》（1900.4.29），《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36页。

眼 20 世纪的世界，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在国民皆有独立不羁之精神，自尊自重之气概。因此，在进步人士看来自由平等学说是“起死回生之灵药，还魂还魄之宝方。”<sup>①</sup>所以，要真正革新中国，避免亡国的命运，就必须根除奴隶性，以自由平等之思想启蒙教育国民，使人人有独立之性质，有自由之幸福，从而培养出国民新型的理想人格。

#### 三、公德与私德——理想国民之伦理特征

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向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因此改造国民旧道德，树立新的伦理观念，便成为新民之第一要务。梁启超为此写了《论公德》与《论私德》两文，从伦理学上讨论我与人、己与群的关系，鼓励人们无所畏惧地向旧道德宣战，进行道德革命，以建立国民新道德。“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sup>②</sup>因此，所谓公德即利群、为公。传统的道德中，国人往往重私德，故不知公德为何物，所以，“我国人多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每顾个人之私事而不为国出力，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sup>③</sup>所以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sup>④</sup>公德固然重要，但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因此二者并行不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不可缺之具也。”<sup>⑤</sup>无私德个人则不能立身，无公德则个人不能成群，皆为立国之本。所以公德与私德是近代国民所必备之伦理道德特征。

#### 四、自治能力——理想国民之政治特征

中国何以落伍，倍受外敌欺凌，时时被有识之士所关注与思索。他们发现其原因在于国人不能组织一合理、秩序之政府。“一言以蔽之，亦曰无政治能力而已。”<sup>⑥</sup>所谓自治，就是不待勉强，不待被迫，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的社会准则。国民具备了很高的自治能力后，就会主动关心时政，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建设。所以自治能力是近代国民区别于传统国民的重要素质。

- 
- ① 《革命军》，《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第 43 页。
  - ② 《论公德》，《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 65 页。
  - ③ 《人性五千年：名人评点中国人》，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第 10 页。
  - ④ 《论公德》，《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 64 页。
  - ⑤ 《论公德》，《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 62 页。
  - ⑥ 《论政治能力》，《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 235 页。

#### 五、冒险和进取——理想国民之性格特征

冒险和进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的保证。在这一点上，近代中国的进步之士达成了共识。梁启超认为，冒险和进取，“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sup>①</sup>革命人士指出，“进取冒险精神，所赖以维持国脉者也。”<sup>②</sup>“世界进步一日千里，不进则退，不奋不起，保守迟疑，沦亡难免。”<sup>③</sup>欧美之所以在近代发展突飞猛进，就在其国民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而在中国，一个人稍有作为、稍事进取，即被斥为好大喜功；另一方面，儒教主张“以冒险为轻躁，以任侠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惟以‘忍’为无上法门。”<sup>④</sup>国民受这种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浸润，结果是毫无朝气，循规蹈矩，不知进取。如此国何以不弱？所以有识之士将“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作为培养国民的重要目标，以此促进国人的振作和民族的振兴。

#### 六、尚武与健体——理想国民之体质特征

世界是一个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大舞台，国民体质的优劣，无疑是竞争的重要条件。理想的国民不仅应具备强烈的近代意识，也须拥有强健的体魄。“举国病夫”岂可在天演竞争中取得优势。“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sup>⑤</sup>因此尚武健体便成为进步人士的理想追求。他们主张弘扬尚武精神，要求国民强心力、壮胆力、增体魄、重振雄风。梁启超指出：“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从此而出与犷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sup>⑥</sup>因此有识之士呼吁对国人进行军事训练和体育教育，以期“基础既坚，体质既固，虽使千锋万刃，任间而可得闯入乎？”<sup>⑦</sup>其主张的着眼点在于以军事、体育训练培养国民意志与体魄，改变一盘散沙的现状，洗刷东亚病夫的形象，进而达到拯救民族危机、争取民族独立的目标。

① 《论进取冒险》，《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79页。

② 《云南之民气》，《云南》第7期，1907年7月。

③ 《发刊词》，《云南》第1期，1906年10月。

④ 《论尚武》，《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⑤ 《论尚武主义》，《东方杂志》第2卷第5号，1905.2。

⑥ 《论尚武》，《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1页。

⑦ 《军国民思想普及》，《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3月。

### 第三节 国民性改造的途径与方法

如何改造国民性、铸造新国民？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各个派别，虽然由于他们政治改革观点的差异，使其国民性改造的方案或许大相径庭，但是由于他们在改造国民性，铸造理想国民目标上的趋同，即用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 and 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来培养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格国民，所以他们在具体改造途径和方法上，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 一、教育新民

主张国民性改造的进步人士，无论其政治主张趋于保守还是趋于激进，都意识到教育是培养近代国民，使其保持国家观念，具有权利义务思想的必由之路，可扭转民众萎靡，国势颓败的局面。当时进步舆论认为：“察今日之时，度今日之势，救中国之亡，拯吾民之危，必以教育为第一义。”因此一时之间，“以教育自任，以开化为职，播革命之种子，涌独立之风潮”的学校、学堂、夜校、公共讲堂、报馆等纷纷成立，蔚为壮观。<sup>①</sup>当然各派别的内容各有所侧重，维新人士以“三民”论为蓝本，立宪人士则以西方资本主义国民为参照，主张去旧纳新，而革命人士则提出“革命教育”的主张，新文化运动人士则注重民主与科学。虽然如此，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通过教育来去掉国民劣根性，实现优良国民性的培养。

#### 二、报刊新民

报刊是近代一种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梁启超指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sup>②</sup>当时中国风气未开，民智未进，民众对国内和世界诸事知之甚少，所以报刊的宣传作用更显得举足轻重。在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中，先进人士非常重视报刊的宣传。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报刊事业长达 27 年，与之有关的报纸近 30 种。其它如严复、陈少白、陈天华、章太炎、宋教仁、陈独秀等都对报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通过报刊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事实，以醒国人；揭露封建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以荡尽国民的奴隶性，实现国民

① 《与陈君逸庵论杭州宜兴教育会书》，《新世界学报》，第 12 期，1903 年 3 月 12 日。

② 《清议报 100 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第 44 页。

性的近代重塑。所以报刊在近代启蒙民众、开启民智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时人在一《竹枝词》中所说：“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sup>①</sup>

### 三、以各种文艺形式新民

近代中国思想界十分重视各种文艺对国民性改造的作用。鲁迅后来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sup>②</sup>具体表现在：其一，当时进步思想界十分重视小说的传播和启迪作用，认为小说的讽刺与感染效果是开发民智的最佳艺术手段。进步人士一改千余年轻视小说，视小说为旁门邪道的观念，将小说提高到启迪国民之魂的地位，认为小说是“牵引国民前进的灯火”。梁启超对小说的强调言辞浓烈：“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sup>③</sup>为此，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帷幕。众所周知，利用小说新民最力之人首推鲁迅，他的小说至今依然有口皆碑。其二，注重戏剧。当时戏剧亦被思想界推崇。一方面改革传统剧目，编写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剧目；另一方面，引进新剧种，话剧的传入强化了戏剧的社会教化功能。其三，进步人士十分重视近代音乐。主张把音乐列为学校教育普通课程，强调要改造国民品质，“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一要件”。<sup>④</sup>

所有这些关于改造国民性途径与方法的见解和主张，都是一种积极可贵的探索，它为我们积累了经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积极意义。

① 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18页。

②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7页。

③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1996，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71—177页。

④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第213页。

## 第四章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评价

国民性改造思潮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出发点，以改造国民性格与国民意识为目的，追求中华民族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潮，是中国近代化思潮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个因子。因此，这一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可抹煞的地位。

其一，国民性改造思潮是一次范围广泛、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虽然进步人士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但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却同声相应，从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思想大家到名不见经传的知识分子都奋袂而起，挥笔上阵。一时之间，报刊杂志、书籍充满了批评呐喊之声。《新民丛报》不胫而走，轰动一时，遍及海内外；《革命军》更是掀起了革命思想的狂澜，人们开始关心时局，并投身救亡的洪流中去；《新青年》的影响和地位，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更是绝无仅有。如此金鼓齐鸣，万箭趋的的声势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的。

从内容上讲，主张国民性改造的进步人士，与旧式的精英人物不同，他们抛弃了从古代文化典籍中寻觅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陈旧批判模式，而是以西方国家的国民性为参照系，通过批判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民族性格，对中国国民性作一新的界说，以促进中国国民性的新陈代谢。他们突破中国传统人性完美无缺的古老观念，用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来重铸国民性，以使新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其它的先进社会制度获得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和精神土壤。因此，这种思潮给国人的心灵带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提高了国民的思想认识，激发了国民的革命热情，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扫除了文化心理障碍。

其二，国民性改造思潮是中国近代化思潮深化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时也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这个历程无疑体现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人类历史往往是在一种“血与火”交融的痛苦中前进的。这在中国近代就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中国要走出中世纪，顺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就得有赖于西方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又不能无视西方近代文明对自身的挑战、冲击和碾压，必须在应战和反抗中保存和确证自己。因此，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焦点上凝聚着两个课题：作为客体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近代化和作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近代化（即人的近代化），这是一个双重近代化的过程。洋

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印证了中国客体近代化的渐进。而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在中国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批判和反省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提出了人的改造即人的近代化问题。表明思想界近代意识的增强和知识分子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进步人士的探寻的目光，已不仅仅限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客观外在现象，而是已深入到隐藏于深层而又影响至深的内在东西。在他们看来，近代化已不仅限于物质制度层面，而涉及到人的素质塑造。随着中国客体政治经济结构近代化的深化，对人的近代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刻。围绕着什么是人的近代化，为什么要实现人的近代化，怎样实现人的近代化等问题，进步人士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可以说，自此以后，对于中国传统国民性的反思，一再拨动每个关心祖国命运的国人心弦，成为一个常新的话题。

在清末民初的国民性改造思潮中，进步人士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激烈而又痛彻，对理想国民性的设计完美而又细致，而对改造的途径与方法更是穷其心思，见仁见智。但他们为何未能最终完成国民性的改造呢？这当然与当时变动极为迅速的社会形势有关，但我们若从思潮本身考察，就不难发现其所带有的种种时代局限。

其一，在理论上，进步人士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理论准备不足。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议论文章，多是一些短论，往往就事论事，激情有余而理论深度不够。他们对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危害、根源以及如何改造问题，虽然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议论，但总的看来，分析、挖掘、阐述不够透彻、深入、全面。1923年梁启超就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末三四十年间整个思想界有“两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这种理论上的混乱与肤浅势必使他们的启蒙宣传带有种种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批判缺乏理性。国民性具有两重性，因此，任何民族的性格都有其优点和缺点。进步人士对中国国民性的优劣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对国民性评价普遍失之过苛。他们对劣根性揭露不遗余力，几乎把国人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危言耸听或言过其实的描述，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人已无可救药，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这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他们对民族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一笔抹杀，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顶礼膜拜。因而难以找到真正的新民之道。

（二）未能找到劣根性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进步人士在寻求国民劣根的成因时，过多地归结于封建专制、伦理纲常、愚民政策和历代宣教等，却忽视了各个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对国民心理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只是表面地看到社会政治风俗对国民性

的影响,而未认识到二者都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之中。1912年,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发起“社会改良会”,旨在加强民主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他们认为我国“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诛,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sup>①</sup>为此,必须“尚公德,尊人权”,倡导自由意志。由于辛亥革命并未触动中国社会封建经济的基础,所以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多少成效。

(三) 缺乏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改造的意识。进步人士对国民性的作用评价过高,“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sup>②</sup>似乎只要一改造国民性,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即可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变革,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都有赖于国民性的改造。因此,他们全力倾注于人的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精神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实际上,国民性的改造,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文化建设,它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推翻其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人的根本改造,从而自觉地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

(四) 未能正确处理国民性改造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国民性改造与社会变革二者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的关系问题。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近代化与人的近代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近代化就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人的近代化也就意味着社会近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完全等同,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社会近代化决定人的近代化,人的近代化推进社会近代化。这就是二者的辩证关系。由于时代的局限,20世纪初进步思想界对国民性改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完整的理解,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为抑制革命,立宪人士极力贬低国民素质之低下;为强调革命可行,革命人士则夸大国民的觉醒程度。结果是国民性改造因革命的急流而浅尝辄止,社会变革又因国民素质太低而难以真正成功。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再审视这一问题,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已不是采菊东篱、从容论道的时代,而是一个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并存的时代。这个时代,救亡图存压倒一切。虽然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最终目的也是救亡,但民族生存的危机决定了这一思潮无法找到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从容进行新民的实践。“故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sup>③</sup>因此,当时中国的首要课题是社会革

① 《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第377页。

②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48页。

③ 飞生:《近时两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8、9期,1903年10、11月版。

命，即必须摧毁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实现中国社会制度和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真正变革。唯其如此，国民性改造才有一个可靠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离开这个基础孤立地谈国民性改造，终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其二，在实践上，进步人士的启蒙宣传脱离民众。国民性改造，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千百万民众追求自身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讲，国民性改造只有靠千百万民众在改造客观世界即追求自身解放的事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而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对中国传统国民心理结构的反思，只停留在少数精英的范围内，他们的启蒙宣传，也只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内，没对下层民众采取有针对性的宣传，因而得不到下层民众的支持，使他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缺少坚强的社会后盾。由于进步人士不能把国民性改造与民众解放联在一起，所以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个体与群体，自身与民众的关系。他们实际上把国民性改造这一群体事业，看成是少数精英的赐予。这样，他们虽然提出了国民性改造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却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社会物质力量和正确途径。

## 结 语

本文动笔之前，笔者曾期望通过多方面的分析，能对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从宏观上有个整体完整的把握。然而成文之后，笔者才意识到当初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本文之所以以“思潮”命题，就是希望能够借助于当时报刊杂志史料的收集，对当时各色人等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认识有一个了解，虽然笔者也作了一些努力，但依然没有跃出精英文化研究的窠臼。在研究和行文过程中，笔者发现，近代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与描述，数量众多，内容博杂，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大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范围，也可转换视角，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同时，在近代中国，当国民性改造思潮兴起流变之时，国粹主义思潮、教育救国思潮，保守主义思潮等各种思潮不断涌起，且相互作用与影响。因此，探寻国民性改造思潮与这些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有研究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国民性考察的是国民的行为及心理特征，所以，适当借助于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这思潮进行研究，尚需进一步加强。

## 附录：参考文献

### 一、文献史料

-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书店出版社，2000.6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书店出版社，2000.6  
 《新民说》梁启超，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  
 《新青年》陈独秀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  
 《天演论》严复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  
 《海国图志》魏源，岳麓书社，1998.11  
 《校邠庐抗议》冯桂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编，中华书局，1981.1  
 《严复集》王栻编，中华书局，1986.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枏编，三联书店，1977.12/1978.10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  
 《梁启超选集》李华兴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  
 《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2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6.2  
 《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吴根樑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8  
 《浙江潮》（台湾），罗家伦主编，1983  
 《国民报》（台湾），罗家伦主编，1983  
 《游学译编》（台湾），罗家伦主编，1983  
 《湖北学生界》（台湾），罗家伦主编，1983  
 《国民日报汇编》（台湾），罗家伦主编，1983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朱维铮、姜义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9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9  
 《宋教仁集》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3  
 《陈天华集》刘晴波、彭国兴编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1

### 二、专著、论著

- 袁仁贵：《人的素质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12  
 殷陆君：《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刘豪兴：《人的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9  
 张 猛：《人的创世纪》，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赵光远：《民族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2

- 李述一：《文化的冲击与抉择》，人民出版社，1987.5
-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
-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
- 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3
- 史革新：《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6
- 胡绳武：《中国20世纪全史》（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5
- 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1
- 李麟：《东方人与西方人：各国国民性格管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
- 景天魁：《中国国民素质考察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4
-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
-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7
- 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7
- 吴雁南：《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8
- 彭明：《近代中国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大出版社，1999.3
- 郑剑顺：《中国近代人才思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2
- 郑欣淼：《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9
- [美]西里尔·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10
-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6
-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
-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10
- 马勇：《1894—1915：梦想与困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
- 韦杰廷：《孙中山教育思想初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2
- 彭平一：《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大出版社，2000.4
- 黄顺力：《从林则徐到毛泽东：中国人百年救国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 李珂：《人性五千年：名人点评中国人》，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1
- 李双璧：《从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的历史考察》，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8

### 三、论文

- 《论辛亥国魂之陶铸》章开沅，《江汉论坛》，1983.2
- 《严复与近代思想启蒙》何晓明，《福建论坛》，1986.2
- 《试论梁启超〈新民说〉的启蒙意义》陈华新，《广州研究》，1987.2
- 《论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方志钦，《广东社会科学》，1986.4
- 《严复“三民”思想简论》郭国灿，《福建论坛》，1986.6
- 《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公民意识》胡代胜，《政治学研究》1988.1
- 《人的现代化》（上）田森（日本），《社会学探索》，1987.2
- 《人的现代化》（下）田森（日本），《社会学探索》，1987.3
- 《1900—1910年中国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的思想》王荣国，《厦门大学学报》，1987.3
- 《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胡代胜《中州学刊》，1987.5
- 《“新民说”及其命运：梁启超的新民说》徐允明，《北京社科》，1987.3

- 《失落的群体：论严复思想启蒙运动失败的关键》吴重庆，《福建论坛》，1988.6
- 《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郑师渠，《天津社科》1988.6
-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识历程》庞村，《教学与研究》，1988.1
-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汪林茂，《杭州大学学报》，1988.1
- 《我国近现代批判理性的成长》刘再复、林岗，《社会科学辑刊》，1988.1
- 《鲁迅与梁启超》王强，《天津社科》1988.4
- 《辛亥革命与国民性改造思潮》陈高原，《广州研究》，1988.7
- 《近代中国对传统国民性格的第一次反思浪潮》张海林，《社科信息》1988.3
- 《简论梁启超对现代人的构想》阎小波，《社会学探索》，1988.5
- 《梁启超与国民观念》胡代胜，《书林》，1988.6
- 《论人的近代化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陈中凡，《学术研究》，1988.5
- 《本世纪初我国进步思想界对奴隶主义的批判》张锡勤，《学习与探索》，1988.6
- 《论1903年前梁启超的国民道德思想》李双璧，《贵州社科》，1984.5
- 《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思潮的萌生与拓展》阎小波，《社会学探索》1989.6
- 《论梁启超的“国民观”》沙磊，《学习与探索》，1989.4
- 《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崔志海，《近代史研究》，1989.4
- 《危害社会变革的丑陋心态录》喂兴，《学习与实践》，1989.9
- 《辛亥革命与国民意识的崛起》张元隆，《探索与争鸣》，1991.6
- 《近代尚力思潮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郭国灿，《学习与探索》，1990.2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莫志斌，《苏州大学学报》，1989.2
- 《论近代从性思想之特点》瞿永玲，《华中师范大学》，1991.5
- 《中日近代新学“人”范畴比较》李甦生，《日本研究》，1991.4
- 《新民理论与近代理想人格》郑健英，《求是学刊》，1991.2
- 《新民与强国：严梁“新民说”评析》田文军，《武汉大学学报》，1992.3
- 《新民之道与人的现代化》周武，《探索与争鸣》，1992.6
-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近代思想之比较》高力克，《世界历史》，1992.2
- 《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陈高原，《近代史研究》，1992.1
- 《传统人格的近代裂变》朱义禄，《学习与探索》，1992.4
- 《晚清人权思想的传入及影响》，《天府新论》，1992.5
- 《近代尚力思潮中严复、鲁迅、毛泽东的逻辑演化关系》，李力研，《北方论丛》，1992.6
- 《梁启超的国民精神批判》贾云平，《社会科学家》，1992.5
- 《论20世纪初年的国民思潮》张俊霞，《近代研究》，1993.1
- 《严复与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杨义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2
- 《中国近代新学家论人的重塑》张锡勤，《学习与探索》，1994.2
- 《论人格解放和近代政治变革》朱义禄，《东方论坛》，1994.3
- 《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的先声》崔志海，《史学月刊》，1994.4
- 《简析孙中山的心性文明思想》肖万源，《近代史研究》，1995.6
- 《屈辱与觉醒：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更新与发展》，沈嘉荣，《南京社会科学》，1994.10
- 《严复与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杨义银，《西南师大学报》，1994.3
- 《近代中国人的三次反省》，沈嘉荣，《光明日报》，1994.11.28

- 《梁启超的启蒙的思想》梁念群、周忠,《河北学刊》,1995.3
- 《论我国人的现代化实现途径》王格方,《山东社会科学》,1997.2
- 《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初探》朱小玲,《南京师范大学》,1996.1
- 《梁启超“新民说”论纲》张锡勤,《求是学刊》,1996.5
- 《要现代化必须改造国民性:论晚清新民思潮》,《探索与争鸣》,1997.4
- 《试析五四思想家的立人思想》吴乃华,《学习与探索》,1997.1
- 《论辛亥革命前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周建超,《江海学刊》,1997.5
-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吴乃华,《江西社科》,1997.4
- 《中国近代新公德观略论》吴健瑛,《求是学刊》,1997.4
- 《梁启超与新民说》周建超,《江苏社科》,1997.4
- 《梁启超与近代道德转型》,温克勤,《现代哲学》,1998.3
- 《20世纪初趋新社群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刘增合,《江西社科》,1998.2
- 《从梁启超到鲁迅:关于国民素质改造问题》,张立芳,《山东社科》,1998.3
- 《论〈新民说〉对近现代人格的初步构建》刘长林,《学术界》,1998.4
- 《略论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体认》,《学术月刊》,1998.12
- 《毛泽东早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潮》牟正纯,《山东社科》,1999.5
- 《近代启蒙思潮对纲常名教的批判》贺志朴,《社科战线》,1999.6
- 《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中的社会公德思想》刘嘉桂、姜迎春,《江苏社科》,1999.1
- 《论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刘小林,《广西师大学报》,1999.3
- 《梁启超的民族观》安静波,《近代史研究》,1999.3
- 《论康有为开民智思想》俞祖华,《社会科学辑刊》,1996.4
- 《从“文国”到“主人”爱国主义从近代到现代的演进》王培元,《社会科学辑刊》,1996.5
- 《比较文化视野里的中国人形象》俞祖华、赵慧峰《中州学刊》,2000.5
-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简论》袁洪亮、郭汉民《中州学刊》,2000.5
- 《清末民初进步人士对提高国民素质的思考》胡瑞华,《光明日报》,2000.8
-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袁洪亮,《史学月刊》,2000.6
- 《国民性:沉郁的关怀》张宝明,《郑州大学学报》,2000.3
- 《福泽渝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比较》郑浩澜,《江西社科》,2000.5
- 《论辛亥革命前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彭平一,《求索》,2000.4
- 《针砭国民,惊醒国魂: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中国社会病症的透视》候艳华,《安徽史学》2000.3
- 《梁启超论国民性改造途径》,《齐齐哈尔师大学报》2000.6
- 《关于民族精神的病灶与其它》龚书铎,《高校理论战线》,2000.6
- 《近代中国的自强精神》张锡勤,《学习与探索》,2001.1
- 《林语堂的树人思想》施萍,《中国文化研究》,2001.2
- 《梁启超与国民改造问题研究》王显成,《湛江师院学报》,2001.3
- 《评陈独秀改造“国民性”主张的演变》郭绪印,《陈独秀研究》第一辑,东方出版社,1999.3
- 《简论梁启超“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思想》曾凡炎,《贵州师大学报》,1994.2
- 《教养有道勃然兴:论郑观应与“开民智”》齐国华,《史林》,1996.2
- 《中国近代人的观念演变》陈廷湘,《社会科学研究》,1994.6